

参照经验与综合情境： 对河北定州农民种地实践的一种解释

张 龙

内容提要：在农民种地实践和行动逻辑方面有“道义小农”和“经济理性”的经典理论。这一经典论述成为部分研究者探讨当代中国农民行动逻辑的理论基础。但“道义小农”与“经济理性”的理论可作为分析工具，却不应成为我们对农民认识的限制。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农民在种地实践中是否改变自己的种地行为，既非完全受生存伦理制约，也非完全由经济理性影响，而是在充分考虑参照经验基础上进行选择，其所遵循的是一种实践逻辑。现实经验提醒我们要关注农民身处的综合情境，关注不同农村和农民所处具体环境的特殊性，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当代农民的农业实践活动及农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

关键词：参照经验；综合情境；种地实践；实践逻辑

中国农村经历了集体化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农业经营的基本制度由人民公社转变为统分结合，家庭联产承包使农户重新成为农业经营的决策者。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不再是被安排完成劳动任务的接受者，而是农业实践的主动发起者。这意味着要理解当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就必须将农民作为主体之一纳入考量范围，换句话说，如何理解农民的行动选择对理解农业现代化进程来说具有前置性和基础性的意义。作为与土地及农业实践紧密联系的行动者，农民改变或维持某种种地行为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他们遵循何种逻辑？结合定州市农民的种地经验来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农民的种地实践，并以此为基础在更大层面上讨论农业现代化进程。

一、关于农民种地实践的研究回顾

在农民的种地观念及行为倾向上存在着生存与理性谁为第一的讨论。实体主义理论家如恰亚诺夫、波兰尼和斯科特等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要放在社会系统中认识，安全和保险是农民行动的首要逻辑，生存

作者简介：张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基金项目：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的支持。项目名称：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治理转型——河北定县农村百年演变的调查研究（项目批准号：15XNLG04）。

取向的农民更倾向于避免风险,不会选择可能带来更高利益,也有可能一无所获的投资机会(刘金源,2001),因此是“道义小农”。

恰亚诺夫(1996)认为对农民的研究大多站在客位来理解农民,而只有从主位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其经济行为。其在对俄国小农的论述中提出农户家庭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家庭内部的劳动力供给能力和产品对需求的满足能力是家庭经济的核心。当农户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辛苦程度与增加产品对需求的满足达到均衡时,农户的经济行为就趋于稳定。因此农户家庭在劳动力供给能力上的不同是家庭经济分化的最主要标志。小农经济行为的逻辑也由此可以看出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需求,而非资本主义式对利润的追求,资本主义的利润计算方式不适用于小农的家庭生产。

波兰尼(2013)认为从历史上看,经济系统经历了与社会系统的嵌入、脱嵌和再嵌入过程。人们的经济关系包含在总体的社会关系之中,个体行动的目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财产,而不仅仅是经济财富。个体的行动总是受到社会规范,如“互惠性”要求的制约。因此对于经济的分析不能单纯从理性、市场及利润等角度出发,人们的经济行为受到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影响。沿着这一理论,对农民种地行为的理解需要扩展到社会结构与农民的社会关系之中。

斯科特(2013)在对东南亚农民的生产与生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小农经济是一种道义经济,其首要考虑的是家庭生计和生存伦理。斯科特认为由于生活在生存危机的边缘,农民根本没有机会进行古典经济学所说的最大化利润式的思考,“安全第一”是首要原则,农民生产的首要目的是竭力避免任何导致生活被毁灭的可能。在斯科特笔下,农民并非不会进行追求利润的思考,他们之所以不这样做,是受到生存危机的威胁而被迫做出更有保障的选择。

另一方面,与“道义小农”不同,形式主义理论家如舒尔茨和波普金则认为农民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可以被视作经济理性的个体,其在面临有风险的投资机会时并不会因为“安全第一”的想法而退缩。农民具有的经济理性并不比企业家逊色。(林毅夫,1998)

舒尔茨(1999)认为农民也是经济理性的个体,在传统农业生产中是有效率的,并不存在隐蔽失业问题。农民根据自身长期种地实践所收获的经验,已对能利用的生产资料进行了最佳配置。之所以传统农业缺少发展,是因为传统的生产要素回报率低,对储蓄和投资缺少刺激,而同时农民又无力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则可以从这一特点入手,加大投资,促进投入,鼓励农民使用新的生产要素,并进一步增加农民的人力资本,从而打破原有的低效率均衡,促进农业发展进入新的均衡阶段中。

波普金在舒尔茨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农民的意识及行为都是理性的,会计算自己经济行动的付出与收益,从而实现效用最大化。其将农民视为投资者的角色,而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农场,在他看来则是同公司一样的经济组织。农民明确自身的利益所在,同时也会与他人讨价还价以确定一个双方同意的妥协结果。(郭于华,2002)形式主义理论家阐明了农民作为理性行动者的角色。在其笔下,农民种地是精心计划的行动,是在对现有资源利用基础上,对风险和利润评估后做出的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选择。

实体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论述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学界认识中国农民的理论基础。研究者大多在两派的对话中探讨当代中国农民的行动逻辑。一方面,有研究者将经典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于对农民的解释。其将“生存第一”视作传统社会中农民面临生存危机时的主要逻辑,多表现出保守与安全的一面,而“经济理性”则是现代社会中生存危机解除后的西方经验。理论层面看,随着社会发展,生存伦理下的“道义小农”将转变为受“经济理性”指导的农民。(姚自立、张红,2016)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物质装备和

技术进步的同时也需要农民的现代化,这意味着农民种地的目的要从满足家庭需求转变为追求最大利润。(李小丽,2008;朱启臻,2013)从实际层面看,当前我国农民经济行为的一大趋势是由生存理性转向经济理性。(李红涛、付少平,2008)研究者将处在这种状态中的农民称之为“过渡小农”(高帆,2008)或“现代型农民”(王宇雄,2016)等。通过将“道义小农”和“经济理性”定位为两个前后相连的发展阶段,研究者避免了经典理论的争论,并将对当代中国农民的关注引入这一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发展体系中。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尝试跳出经典理论的结论,提炼本土化的农民形象与逻辑。研究者认为经典论述在特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下对于农民的种地实践具有较强解释力,但却无法适应当代中国高度社会化、小规模家庭经营同时税费全免的具体情况。(邓大才,2006)当代中国农民已经大部分脱离了“生存小农”的境遇,但却未及“理性小农”的程度,处于二者之间的特殊阶段。因此需要用新的概念提炼其间的具体性与特殊性。有研究者提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农民由传统的自给自足转变为被卷入社会化的分工网络,由于衣食住行各方面货币支出压力的影响,农民倾向于以最大程度的货币收入作为行动目标,因此可以被称作“社会化小农”。(徐勇、邓大才,2006;刘金海,2013)在这一理论下,农民摆脱了生存危机的影响,但最重要的仍是努力保证家庭的正常运转;虽然农民以追求最大化货币收入为目标,但却与资本主义企业家“利润至上”的行动逻辑有所区别。此外也有研究者提出当前中国农村已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农民也由传统小农转变为“消费小农”。(陈明,2015)市场化改革使得农民成为微观层面的经济主体,是“市场化小农”。(曹阳、王春超,2009)。在对当代中国农民形象及行动逻辑的探讨中,研究者认为农民被卷入到广阔、动态的市场体系之中,以往自给自足的行为模式被打破,农民的行动逻辑发生了剧烈的转变,经历了“理性化”的过程,因此都处在由“道义小农”向“经济理性”发展的中间阶段。

可以说,无论是认为农民正处于由“道义小农”向“经济理性”的转变过程中,还是以新的概念及理论进行阶段性归纳和抽象的尝试,都是试图解释当代中国农民发生的变化及具有的特点。研究者注意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社会活动半径的扩展,看到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打破之后农民在市场化改革中强烈的经济追求。他们尝试找到一种方法来概括伴随中国农村各方面改革不断深入而变动的、已经受到原有“小农”或“农民”概念束缚的农民群体。但其尝试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一方面,在研究者的处理中“道义小农”和“经济理性”构成了一对相互对立的逻辑进路,从个体层面看存在家庭需求和最大利润的对立,从集体层面看则具有竞争与互惠的对立。但现实中道义与理性并非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农民的种地实践总是处在满足家庭需求和追求经济效益之间,它既是经济的,又是社会的。农民既可能为了追求效益进行投资,也有可能陷入危机时选择安全与稳定,甚至在没有生存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做出保守的选择。生存伦理和理性计算虽然在逻辑上互斥,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可以共存。将农民的行动倾向与逻辑归结于“道义小农”和“经济理性”之一意味着按照单一的理论进路来认识现实,是犯了贴标签式的错误。(郭于华,2002)肯定农民在改革中不断提高经济理性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农民的“土地情结”以及将土地作为生活保障的具体实践。(王露璐,2015)

另一方面,无论是两阶段还是多阶段的认识,都将“道义小农”和“经济理性”作为发展的两个端点,这样的处理预设了既定的社会发展方向,并且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能够在其中得到解释。现实中农民的种地行为是否都有如此明确的目的性?换句话说,农民的行为选择既受到其自身生存境遇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制度安排的约束,因此是复杂、具体的。“道义小农”和“经济理性”都是建立在特定社会背景之下,有其具体的社会基础。将当代中国农民的行动置于由此至彼的发展进程中,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假定了社会的发

展方向,而这一假定之于中国社会的适用性也是值得讨论的。

本文认为,“道义小农”与“经济理性”的经典论述背后所探讨的是如何理解农民的种地实践,亦即农民的种地观念和行为遵循何种逻辑,其分别从一个方面进行了回答。这样的视角对于认识当代中国农民及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将二者之一当作农民行动逻辑的全部出发点,或是构建出线性的发展进路则超出了其解释范围。经典理论是我们认识现实的工具,而不是划分现实的原则或标准。中国农业发展既在经典理论的视域内,同时又因其历史中的延续性与特殊性而具有本地特点。因此重要的不是判断农民的行为是生存取向还是经济理性的,而是从经验出发,探讨农民在种地实践中受主观因素和结构、环境等客观因素影响而做出特定选择的原因,这样才能在中国社会环境下更好地回答经典论述提出的问题。

二、农民的种地实践及其解释

2015年10月至2017年1月,笔者在河北省定州市数个乡镇村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期间以访谈、参与观察及问卷调查等方法走访了一些乡镇干部、村两委干部及村民。以下通过对Y乡农民农业实践经验的分析,对当代中国农民的种地实践及行动逻辑进行一定的探讨。

(一)Y乡的农业表现

Y乡工业不发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乡,共有10155户,35330人,其中17岁及以下占19.99%,60岁以上占18.41%。^①Y乡共有耕地约33000亩,下辖各村由于耕地面积与人口数量不同,人均耕地多在0.6亩至0.9亩之间。以农户家庭为单位,耕地规模大多在2亩至5亩。Y乡农业以种粮食为主,有少量农户种植蔬菜和苗木花卉,大部分家庭都有人外出务工。在对务农和务工的态度上,Y乡农民表现出以务工为主,务农为辅的特点。该乡曾想引导农民种植蔬菜,发展蔬菜特色产业,但按照主管农业的副乡长介绍,早年还有些人种植蔬菜,后来由于外出务工的吸引力太大,“大家都出去打工了”。

作为人多地少的农业乡,Y乡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劳动力大量剩余而农业收入低的问题,因此农民在流动限制放开后陆续外出务工。城乡二元体制下,在非农产业寻找就业的Y乡农民大多无法享受子女入学、养老,以及就业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户口是这些体制内资源的必要条件。(陆益龙,2008)随着年龄增长,这些农民越来越受到体力和健康等身体条件的限制而难以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因此大多只能回到农村。在调查中一些Y乡农民表示50岁似乎构成了外出务工的门槛之一,过了这个年龄就很难再到活儿。

此时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农业耕种技术,尤其是机械化在节省人工方面的技术进步,使得他们虽无法外出务工,却仍有能力种地,从而获得生活上的保障并对家庭经济提供补充。贺雪峰(2011)认为农民进城可分为两种,其一是在城里买房定居;其二是进城务工以寻求更高收入,为将来返回农村做准备。对于后者来说土地是一种保障。与其论述相符的是,许多Y乡农民一旦失去了在非农产业中工作的机会,同时又无法通过买房或别的方式在城市中生存下来,就将回到农村种地。

由于Y乡外出务工的农民在老年后大多回村,种地成为他们补充家庭收入的主要甚至唯一手段。这

^① 数据来源,Y乡派出所2016年户籍档案资料。

意味着土地对他们来说仍拥有较高价值。在有能力种地的情况下,Y乡农民不太愿意将自家的承包地流转出去,也因此难以将别人的土地流转过来经营。农户之间大多只有因年纪太大、举家外出或身体健康等原因才会将土地流转出去,这种情况的流转费用在每亩地400元至600元。如果家里有人能够种地,想要流转土地的费用在每亩地800元至1000元,基本相当于Y乡农民每亩地种粮食的净收入。

作物选择上,Y乡农民种植的作物以一年两季的粮食为主。五月至十月种玉米,十月至来年五月种小麦。虽然农户家庭缺少生产机械,但以当地的生产条件,作物的播种、耕地及收获等需要重体力劳动的环节都交由社会化服务的机械进行,浇水使用电力机井,只有打农药和施肥等过程需要人力完成。当地玉米的产量在每亩地1000斤至1200斤,小麦的产量在每亩地800斤至1000斤。价格上玉米每斤在0.6元左右,小麦每斤在1.1元左右,因此除去成本,种粮食的收入在1000元/亩左右。

外出务工的话,掌握技术^①的人一天能有300元至500元的收入;不掌握技术的人一天的收入在120元至180元。考虑到外出务工的时间不等,一个普通的Y乡农民外出务工每年大致有两三万的收入,这也是调查中Y乡农民普遍回应的收入水平。从Y乡的情况看,种粮食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普遍已经下降至不到三分之一,农业收入相比于非农产业的务工收入已不占主导地位。

(二)跟风:农民对于农业实践的解释

从Y乡农业的表现看,普通农户在经济上以务工为主,老年或妇女更多在家种地,表现出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作物选择上则主要是传统的粮食作物。由于粮食作物的低效益特点,从农户家庭看似并未实现对农业经营的有效开发与利用。Y乡农民在持续的农业经营中对这一经济效益上的表现有着清楚的认识,访谈中有农民表达了对于粮食低效益的无奈以及对经济作物高效益但高风险的期待与担心:

家里是三亩九分地……主要是我爸妈种地。地里全部种粮食,也就是小麦和玉米。没有种经济作物……我们倒是想种经济作物,但是没有路子。就是没有销路,也没有这些经济作物的信息来源,不知道上哪儿了解这些信息。(访谈对象LF,男,32岁)

这一对经济效益的认识在Y乡并非个案,可见Y乡农民对于高经济效益的追求持有积极的肯定态度,这意味着在对经济效益的认识与追求上Y乡农民与“经济理性”所论述的情况类似。其种粮食的实践并非因为缺少这一必需品,正相反,收获的粮食大部分用于出售。在2017年我们对定州农村社会的概况调查^②中询问了粮油作物的出售比例,在941个有效回答中,最小值为0,即完全不出售;最大值为100%,即全部用于出售,均值为59.00%,意味着定州市农民将接近六成的粮油作物用以换取经济收入。

表1 粮油作物的出售比例表

粮油作物出售比例	频次	频率(%)
0~25%	207	22.00
26%~50%	182	19.34
51%~75%	158	16.79
76%~100%	394	41.87

数据来源:2017年定州农村社会概况调查。

① 技术在当地农民口中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通常会以“瓦工”“电工”等作为说明,而大多数人从事的“建筑工”在他们看来则是不掌握技术的工种。

② 本次调查运用PPS抽样先在所有村中抽出50个村,再从每村中定额抽取30户。入户则依据KISH表抽取调查对象。最终有效村民问卷1239份。

在务工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家庭基本生存需求,即不存在“道义小农”所论述的生存危机情况下,为什么他们不改变作物结构,寻求具有更高经济效益,同时也有更高市场风险的经济作物呢?在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上,一方面部分Y乡农民认为自己不掌握市场和作物信息,也缺少了解这些信息的途径,因此担心经济作物赔钱,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

我不轻易相信别人,比如说种子吧,别人实验以后我才会去种。有的人可能说什么品种好,它有可能是真的好,但我不会第一个去种。等别人种了,试验了,看到效果确实不错,我才会去种。(访谈对象GXG,男,51岁)

也有Y乡农民认为虽然粮食效益低,但自己并没有什么愿意或者不愿意的想法,主要是看周围人怎么做。如果周围的农户都改变种植习惯了,自己也就跟着改变,如:

家里有5.4亩地,还流转了别人4亩地,地里主要种小麦和玉米……对于土地流转谈不上什么愿意不愿意的,主要是随大流,村里其他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访谈对象LLS,男,61岁)

此外也有农户表示由于家庭经济上主要依靠外出务工的收入,农业收入只构成了很小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农业实践并不构成家庭主要的生计模式,因此对于调整种植结构或者改变经营方式等并不关心。在这类回应中,农民认为地里种点粮食够吃就行了,如:

家里人都在外面打工,最要工作就是出去打工,儿媳妇也在市里超市干活儿。家里生活不靠地里的收入,因此也没想过是不是要换经济作物。(访谈对象HDJ,女,48岁)

从Y乡农民对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回应看,其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并非所有人都具有明确的目的,对于很多农民来说,“大家种什么我就种什么”或者“别人效益好我就跟着种”是农业实践所遵循的逻辑之一,表现出跟风的特点。跟风常被用来说明农民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劣势与非理性特点。看见价高一拥而上,来年供大于求造成亏损的例子屡见不鲜。但农民的跟风行为也并非全部失败,在某些条件下农民的跟风行为也能引发作物结构调整、主动连接市场、土地流转、雇佣劳动甚至于建立合作社或公司等经济组织这样的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因此重要的不是批评跟风行为,而是理解农民跟风的逻辑。

农民的跟风行为并不罕见。在2017年对定州农民的抽样调查中,我们设置了一道题请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回答:“您家最主要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种植这种经济作物的信息的?”在回答中48.85%的农民选择了“看见别人种”这一选项,意味着接近一半的农民在作物结构的调整上是跟风的。

表2 经济作物的信息来源表

选项	频次	比例(%)
亲戚朋友介绍	17	6.54
农业技术人员推广	3	1.15
看见别人种	127	48.85
自己从市场了解到	40	15.38
其他	73	28.08

数据来源:2017年定州农村社会概况调查。

三、参照经验与综合情境

从表现上看Y乡农民的农业实践更注重家庭生活所需,不愿意冒风险因而种植粮食作物,偏向于“道

义小农”的论述。但正如前面提到的,当我们将视角转向农民自身对这一行为的解释时会发现,农民种植粮食的选择与实践是具体而复杂的,不能进行如此简单的归类。一方面,“道义小农”的前提条件是生存危机的出现,正因如此斯科特才反复强调小农“水淹至颈”的境遇。而Y乡农民已经不再处于生存危机边缘,仅凭外出务工的收入就足以保证一家人的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改变作物结构,将农业活动转变为对更高,甚至最大利润的追求。另一方面,虽然脱离了生存危机的影响,并且对于经济效益有明确的认识与渴望,但Y乡农民却大部分紧紧抓住承包地不放,宁愿种植效益较低的粮食作物,而不改变种植结构。“经济理性”也无法解释其在作物选择方面表现出来的粮食偏好。

Y乡在农业上的表现意味着仅从理论逻辑的演绎去理解农民的种地行为是不够的,将道义与理性的经典论述当作我们认识当代中国农民的基础可能会忽略了社会变迁背景下不同地区及行动主体之间的具体性与差异性,因此我们需要在农民的农业实践过程中去探讨其行为的影响因素。从Y乡农民跟风的实践上看,参照经验与农业综合情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农民的参照经验

经验指的是人们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参照则意味着未亲身参与,而是来自于其他对象。农民在农业经营上的参照经验由此指的是通过社会交往圈中其他农民的生产过程了解到的作物与市场信息。除了农业经营以外,农民在日常生活及外出务工等方面也都拥有各自的参照经验,因此参照经验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表现出一定的总体性。跟风意味着农民以参照经验作为农业经营决策的依据,可见参照经验能够指导农民的农业活动,为其提供必要的生产活动信息。

包产到户后Y乡农民回到分散的家庭经营状况,农户需要独立参与市场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小农户缺少与大市场的联系,无法掌握足够的市场信息,也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表现出市场适应方面的问题。但农民在乡村这样的熟悉社会中能够通过聊天、询问及观察等日常方式了解周边农民的生产与市场活动信息,以此来为自己的农业经营提供参考。因此参照经验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农民长期积累下来的对作物与市场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可以被视作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收集信息的方法。

在Y乡农民的农业活动中,由于缺少足够的市场信息,种植经济作物意味着要承担程度未知的风险。按“道义小农”的观点,农民为了家庭需求倾向于避免风险;而按“经济理性”的论述,农民会承担风险以寻求更高的经济效益。但现实中Y乡农民倾向于通过参照经验,观察他人行动来帮助自己判断与决策。在这一过程中,类似“某农户种蔬菜不挣钱”或“今年药材也不行”这样的认识是Y乡农民参照经验的直接体现。这意味着农民的种地实践并非完全的个体化行为,而是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与他者的关系之上,具有主体间性的特点。在Y乡农民的参照经验实践上,其更多依靠的是“口耳相传”或“眼见为实”等直观感受作为自己农业经营决策的依据,意味着其行动的出发点并非完全自身对生存或效益的理性思考。

农民在使用参照经验时,假如这一信息是真实的,他不仅了解到了作物与市场,而且了解到了来源方有获取这一信息的途径;假如这一经验是错误的,农民也能通过这一试错过程了解部分真实的市场信息。这意味着参照经验并非正确有效的经验,其并非一次性的知识,也并非人为建构起来的,而是农民在长期实践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认识。由于具有这样经验主义进化论的特点,参照经验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而是具体的,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在效果上也有面临失败的可能性。然而尽管如此,总体而言Y乡农民在对参照经验的使用中并不会事先去质疑及验证参照经验的可靠性。

可见对于Y乡农民而言,在获取参照经验时,其赋予自己的直觉印象以足够支撑行动的信赖,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是可靠的。无论是与其他农民的交谈,还是看到田里种植的作物,Y乡农民都相信这些是现实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对象,认为它们反映了真实的作物选择与市场行情。类似的直观感受给行动者带来了信息,为其下一步行动提供了依据,这一现象背后所反映的是农民对于身处其中的情境的确信与确认。

(二)农业综合情境

由于精力有限,并且受到交通、科技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个体的社会交往总是有一定的范围。以聚居的村庄或乡镇为单位而言,虽然个体的交往对象存在或多或少的区别,但农民有限的社会交往仍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封闭性。相对的封闭性意味着农民的生活以及农业经营活动是在相对独立、稳定的环境下进行的,在这样的熟悉环境里农民的经济活动具有地方性特征。因此在讨论农民的种地实践与行动逻辑时,不能把农民当作孤立的个体来看待,而是要将其置于具体的情境中。

情境意味着个体在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各项条件下所处的境况。对于农业活动来说,综合情境意味着农民可选择的生产要素、可获取的信息以及所受到的制约等。这一综合情境不仅是农民身处其中的自然环境,还包括了社会及制度环境等。陆益龙(2014a)在考察大寨与小岗两个相对的村庄发展历程中提出村庄特质的命题。大寨具有团结和艰苦奋斗的特质,而小岗则具有个体主义行动取向与策略的特质,正是因为不同的村庄特质导致了大寨与小岗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些村庄特质可以理解为不同村庄所处综合情境的独特性。

Y乡农民所处的综合情境一方面意味着气候、土壤、地势及水源等自然条件,这些因素构成了农业生产活动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土地分配、社会流动及市场条件等社会制度环境,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具体农业经营模式的选择。除了这些外在于行动者的约束外,农业经营作为农民进行的实践活动之一,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农民的主观意义赋予。因此这一综合情境是自然、社会制度及农民主观上对农业活动的意义赋予等多方面共同建构的结果。Y乡农民人均耕地不足1亩,户均耕地集中在2至5亩,农业生产规模小而剩余劳动力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及流动逐渐放开的背景下,农民外出务工成为满足家庭生存和发展需求的主要方式。在自然、社会及个体的共同作用下,Y乡农民建构了“农业—工业”结合的生计模式,这一模式成为Y乡地方情境建构的一部分。

综合情境一定程度上具有自明性的特点。无论是种粮食还是外出务工都是农民在自然和社会各项条件下通过反复尝试与改进形成的具有地方特点的稳定生计模式,在早期建立以及后来的改进中体现了地方社会中行动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综合情境中的生计模式在建立起来以后逐渐具备了稳定性,尤其是对于后来者而言,已经建立的农业经营模式是先于其存在的传统或惯例,在行动上也预先为其设置了一些规范。在人们不了解其生成过程的情况下,这一农业模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便具有了自明性,以至于在后来的行动者看来,情境意味着不言而喻,是通过自己与他人的反复实践而为其所熟知的对象,处在情境中的个体在寻找行动的理由之前就知道该如何行动。

在Y乡农民的种地实践中,由于大家都外出务工并以种粮食作为家庭经济的补充,这一行为模式在各个主体的反复实践下具有地方环境里毋庸置疑的合理性。对于在这一情境中成长起来的个体而言,类似的反复实践构成了情境中的自洽性。其从小就看着身边的农民以种植粮食和外出务工作为家庭生计,这一“农业—工业”模式成为其耳濡目染所习得的经营方式。Y乡农民并不一定需要清楚地明白究竟种粮食有何意义,在综合情境中其以一种自明与例行的方式组织自己的生活与生产,在其进行这样的思考之前,

情境中的自明性就已经足够支撑其行动。“大家/别人不都是这样吗?”是Y乡农民面对“为什么种粮食”这一问题的主要反应之一。可见在这一综合情境下,农民农业实践与其说全都有道义或理性这样明确的行动逻辑,不如说一定程度上是在综合情境中对地方性农业模式的体会、认知与遵从。

这一对传统或惯例的遵从意味着对于Y乡农民而言,农业综合情境一定程度上成为个体内化于自身之中的价值体系以及行动对象。由于内化了综合情境所包含的对农业、作物及市场等方面的认知、评价及约束,农民对其中的各种必然性和可能性都有一定的了解,其在“理所当然”的环境中很少思考“为什么种粮食”这一问题。在情境以外的他者看起来难以理解的行动对于情境内部行动者而言可能具有自然而然以及毋庸置疑的意义。他们的行动以事先存在的综合情境为前提之一。在不少Y乡农民看来,自己上了年纪,又无法外出务工,种点粮食能帮助家里减轻生活负担,是一举多得的选择。在这样的环境与认识下,粮食种植成为一种例行实践,成为Y乡农民日常生活中意义生产的对象。

由于情境中的规范具有自明性及一定程度上为个体所内化的特点,共处于同一情境中的农民之间通常共享这些规范并拥有相通的价值体系,因而能够理解彼此的行为。舒茨认为生活世界是建立在主体间性基础之上的意义世界,由于主体间性的存在,这个世界得以为我们所共同经历与解释,从而成为对众多行动主体普遍有效的世界。(董金权、赵宏斌,2006)他人赋予农业经营的意义与“我”赋予农业经营的意义具有相通之处,而他人对作物以及农业经营模式的选择也因此可以作为“我”的参考。由此自明性的情境中形成了参照经验的直观可靠性。Y乡农民看到他人的农业实践或是听到他人的生产与市场信息,这样的参照经验虽然是直观上的感性认识,但由于在同一情境中,他人这样做一定有其合适的理由,这些理由很可能对“我”而言也是合适的。因此虽然只是感性的认知,但在情境中的参照经验足以支撑Y乡农民的选择与行动。

四、农民的实践逻辑

对参照经验及综合情境的讨论使我们有机会在个体所处的情境中来探讨农民种地的逻辑。在Y乡“农业—工业”的生计模式中,许多农民将外出务工看作挣钱的最主要方式,而将农业看作是补充经济的手段,因此在劳动力的安排上常常出现主要劳动力参与务工,而辅助劳动力则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这意味着对农业实践的分析不能单纯从经济角度切入,而是要注意到农业经营对日常生活的嵌入性。

Y乡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远远超过农户家庭基本生存需求的程度,因此并不面临生存危机的困境,对于种粮食的选择,部分农民表示“就是挣个零花钱”,可见其生活水平已脱离斯科特所描述的“水淹至颈”状态。在这一条件下Y乡农民却并未普遍地进行作物结构调整,仍有很多农户选择种植低效益的粮食作物。但在其种粮食的实践中,满足家庭消耗的同时,大部分粮食仍是出售换取经济效益,而不是着眼于满足家庭生存需求。因此很难说Y乡农民是在“道义”或“理性”这样明确的逻辑指导下进行的生产。另一方面,虽然类似经典理论的明确逻辑无法完全解释Y乡农民的农业实践,但在农民“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以及“大家/别人不都这样吗”等回答中,较为一致的“跟风”意味着背后有着类似的认知与行动倾向,说明Y乡农民的农业经营也并非完全没有逻辑的行为。

(一)综合情境的直观感性与实践逻辑

在既没有明确的逻辑,也并非完全无逻辑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认识农民的农业生产实践?在Y乡当

前农业发展的经验中,“跟风”或“说不清”的情况意味着一种情境中的直观感受指导着人们的行动。

个体周边的环境、制度以及其他行动者构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熟悉情境,即日常生活世界。在现象学的视域中,其构成了一切社会活动不言而喻的基础。(胡塞尔,2002:261-263)如同前面提到的,个体身处其中的综合情境里既包括作为外在约束条件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制度,也包括一套意义体系。制度环境限制下的个体行动、物以及日常生活的整个世界在这一体系中能够得到解释,从而变得可理解。在这样的熟悉情境中个体是适得其所的行动者。

在Y乡农民的综合情境中,各方面条件下形成的“农业—工业”模式既是行动者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建构结果,同时也构成了个体的外在约束性条件。由于综合情境具有自明性的特点,Y乡农民拥有一种对情境的感知,通常不需要太仔细的思考行动的理由与后果,其通过直观上第一时间获取的认知来判断情境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而告诉自己该如何采取行动。这种感知所获取的信息是模糊的,我们以调查中Y乡一位农民口述的聊天过程为例:

什么作物市场行情好,或者准备种什么,都得靠和别的农民交流。看到别人在卖茄子,就去问问“这茄子怎么样啊”,别人要是回答“还行”,就再问一句“还行的话那我也种点吧”,对方可能说“你想种点那就种点吧”。作物的信息就这样了解到。(访谈对象LYX,男,63岁)

“还行”的意思是好还是不好?如果是好的话有多好?在“种点那就种点吧”的回答中到底种多少最划算?这些问题在对话中都没有得到清楚地回答,但却能作为Y乡农民行动的理由。从其叙述中可见Y乡农民所获取的参照经验可能是模糊的,不足以供其进行经济理性一般的计算。在日常生活中农民通过观察和询问这种切身的方式获取感性认识,并进一步对采用何种经营模式,种植何种作物做出判断。这意味着农民的农业活动是在综合情境中对具体场合的感知与理解下的行动。身处综合情境中,并将情境所包含的农业模式及其他规范化了的农民在农业生产环节里往往不需要明确的目的或计算就知道自己该如何行动。在“为什么种粮食”这一问题上Y乡农民虽然给出的回答是具体、多样的,并且可能面向生活的不同方面,但在行动的逻辑上却是同一的,其遵循的是一种直觉、感性的逻辑,即一种“实践感”。

布迪厄(2003)在综合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实践理论。在其看来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的行动者实践并非如同理性主义理论家所论述的一般严合逻辑,同时也并非完全没有逻辑的行为,而是凭借着模糊的直观感受指导实践,这种实践的逻辑并非基于理性或详细思考论证后的产物,而是“习惯、感受和体验等非逻辑因素”(刘少杰,2002:191)。在布迪厄看来,行动者由于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世界之中,情境中的具体性使得其行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选择性。将这种必然性与选择性内化于自身的行动者对于实践活动拥有一种“下意识的把握能力”(布迪厄、华康德,1998:21)。这一能力无须并且来不及进行事前的理性计算以及事后的反思,因而是在一种前对象的层面运行的感性意识(布迪厄、华康德,1998:22)。然而这一感性意识也并非毫无逻辑,其建立在个体将情境中的各项信息与规范内化为自身的性情与行为倾向系统的基础之上,使行动者不致偏离情境中的要求。从而一定程度上进入一种“例行”状态,个体无论在生活还是生产上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做出即时性的反应。

Y乡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往往面临众多的选择,如是否调整作物结构、是否改变农业经营方式、要不要外出务工、家庭劳动力如何分配,等等。行动者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会受到外在的自然条件、社会制度以及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影响,而个体在内化了情境中的结构与规范的情况下会通过对于具体事件的直观感知来判断下一步如何行动,发挥符合结构要求的主动性。换句话说,对Y乡农民而言,城乡之间

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异、包产到户的政策、小规模家庭经营的现实及当地的自然条件等构成了纷繁复杂的外在约束性因素,身处这一情境中的Y乡农民将这些因素内化为自身的认知与行动倾向系统,在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时并非每一次都要进行详细的思考与论证,但在其行动中已经包含了对这些方面的回应。这意味着Y乡农民在日常生活世界中,面临农业生产上的决策时其并非出自对最大化利润的考虑,或是为了满足家庭生存的基本需求,而是遵循的感性实践逻辑。一方面他们对此的决策有一种总体性实践的特点,体现了其日常生活世界的不可分割性,认为农民农业生产持有某种明确的逻辑相当于简化了对其农业实践的认识。另一方面实践逻辑是模糊的,也难以要求他们给出如此明确并且条理清晰的逻辑思路。

这并非意味着Y乡农民不具备或是无法具备经济理性一般的计算能力。在市场化发展程度越来越深入的背景下,农民越来越具有明确的效益观念与经济理性,Y乡农民的经验就是这一现象极好的案例。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社会变迁中,农民身处其中的情境中的结构与规范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其内化于自身之中的认知与行为倾向系统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如同研究者所提及,由于日常生活各方面对货币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农民的行为也越来越面向对货币的获取。因此这一理性选择的明确逻辑或许应理解为农民在实践感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训练出来的结果。

(二)实践逻辑下的农业表现与特点

布迪厄在其实践理论中提到,社会因资源分配等方式而有其客观的结构,并能够对个体的行动予以引导或制约。同时其又以建构主义的视角来认识结构,认为个体的行动参与了社会的建构与更新。(宫留记,2008)其用场域来指代社会中因资源分配而形成的各种位置的社会空间结构,不同的场域意味着不同的资源配置与游戏规则。用惯习指代有关心智和分类图示的稳定而又可转换的行为倾向系统,其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内化于人们的身体之中,作为实践的生成规则起作用。(布迪厄,2003:79-83;刘拥华,2009)

因此综合情境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农民身处其中的场域,通过资源分配、社会制度的限制及历史上的不断实践形成了自身的特殊结构。这些结构中包含了农业实践活动可选择的模式与规范。而农民在内化这些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惯习,即关于综合情境中对作物、效益、手段及市场等方面的认识和评价系统。农民的惯习在受到综合情境这一场域制约的同时,也通过不断的农业实践丰富着自身的内容,并影响着场域的维系和变化。农业生产即是在农民各自的场域中,惯习指导下生成的实践活动过程。农民的农业实践是在未遵循有意识规则的指导下,对“连贯一致且在社会中被理解的”规律性的遵从。在这一过程中参照经验构成了综合情境中实践活动的策略之一,这里的策略指的是客观趋向“行动方式”的积极展开,而非计算与设计下有意图的行动。(布迪厄、华康德,1998:27)总体上看,实践逻辑下的农业生产实践活动具有“紧迫性、模糊性以及总体性”(王树生,2007)特点。

紧迫性意味着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常常面临“当下”的情况。作物生长具有季节性,同时市场行情变幻莫测,因此农业经营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作物选择的影响很可能是短期内不可逆的,一季时间下来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市场窗口期。对于Y乡农民来说,他们常常无法拥有充足的时间去了解足够多的市场信息,也难以验证参照经验的可靠性。在这样的前提下,要不要改种经济作物?改种何种作物?抑或继续种粮食?这些问题对于Y乡农民来说难以在决策前详加思考,农业生产是具有紧迫性的实践活动。

模糊性则意味着农业实践不一定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在场域与惯习的指导下Y乡农民并不需要非

常明确的动机或认识,自己和他人拥有类似的农业生产方式就足以作为支撑行动的理由。

同时,综合情境中农民的农业实践具有多面向和难以分割的特点。经济上追求高效益、提升家庭生活水平以及处理社会关系等需求在农业经营活动中往往结合成统一体。Y乡农民种粮食既满足家庭消费需求,又换取货币实现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还是对乡村生活与社会关系的考虑。有Y乡农民表示,自己不种苗木是因为树苗长起来后会遮挡相邻地块的阳光,容易引起邻里之间的纠纷。等大家都种树苗的时候,自己也就种树苗了。类似的回应意味着农民在综合情境中的实践体现了日常生活世界的统一性。

五、结论与讨论

Y乡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乡,本文希望通过对Y乡农业的介绍来进一步理解当代中国农民种地实践的具体性与复杂性。农民在种地实践中既会考虑家庭需要,也都意识到经济作物能够实现更高效益。这体现了“经济理性”成分的增加。但这一对效益的认识很难说会因为被意识到而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现实。农民的种地行为既遵循一定的乡土文化规范,又发自主观意愿,同时还受到宏观制度结构的限制。这一现象体现了农民经济活动与乡村社会结构的一致性(陆益龙,2014b),体现了不同场域及其间惯习的独特性。因此对于农民道义或是理性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常常难以解释现实中的情况。

在Y乡的经验中,处于自然与社会制度各方面条件限制下的农民建立了“农业—工业”的生计模式,其中农业经营上种植低效益的粮食作物在农民看来是可以理解的行动。在Y乡农民的农业生产中,经营决策并非完全是对家庭需求或效益的考虑,而是很大程度上在情境中对参照经验的参考。从对Y乡农民及农业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定州农民在农业实践中所遵循的是一种实践逻辑,即一种并非完全非理性,同时也无法明确被认识到的逻辑。(刘拥华,2008)这一实践逻辑更倾向于是一种运行于前对象层面的感性意识。Y乡农民在综合情境中权宜行事,根据自身对情境的体认相机做出农业经营决策,一般不会以反思的态度去思考农业活动的意义与可能性,其在进行类似思考以前,情境中的行动者已经知道该如何行动。相比于明确的“安全”或“理性”,定州农民的实践逻辑不如说更具有模糊性,只能提炼到一定的程度,否则就失去了实践的意义。(布迪厄、华康德,1998: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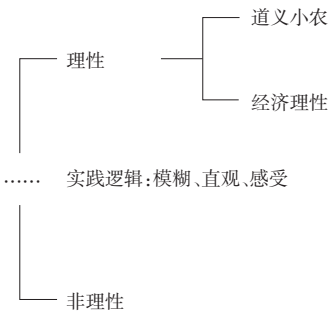


图1 农民实践逻辑的层次

“道义小农”与“经济理性”的理论都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在斯科特等人的论述中,农民面临生存危机的威胁,因此他们必须从家庭需求出发,避免境况进一步变坏的可能。而波普金则认为村庄是一个松散的

团体,农户在其间进行竞争。尽管需要考虑到家庭需求,但农户仍然可以被视作追求利益的投资者。从某个层面来说,这两个理论中的农民都处在一定的综合情境之中。

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变化非常迅速,农民生活、农村面貌及农业经营状况都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生活革命”(周星,2017),对于农民而言,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个方面与之前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变化。因此我们不能套用“道义小农”和“经济理性”的论述来认识中国当代农民的种地行为,而是应该从不同地区、不同农村所拥有的具体条件出发,认识农民身处其中的综合情境及参照经验,分析在实践中造成农民采用不同农业经营方式的具体原因。换句话说,在场域与惯习的具体运作中去探讨农民行动的原因、过程与结果,从而认识农民农业实践的具体性与复杂性。这样我们对中国当代农民的认识才会脱下抽象的理论面具,变得形象和生动起来。

参考文献:

- 波兰尼,2013,《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布迪厄,2003,《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布迪厄、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曹阳、王春超,2009,《中国小农市场化:理论与计量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
- 陈明,2015,《从“社会化小农”到“消费小农”——基于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思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邓大才,2006,《社会化小农:动机与行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董金权、赵宏斌,2006,《生活世界的遗忘与回归:一个社会学的考察》,《人文杂志》第4期。
- 高帆,2008,《过渡小农:中国农户的经济性质及其政策含义》,《学术研究》第8期。
- 宫留记,2008,《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理论探讨》第6期。
- 郭于华,2002,《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读书》第5期。
- 贺雪峰,2011,《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社会科学》第3期。
- 胡塞尔,2002,《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李红涛、付少平,2008,《“理性小农”抑或“道义经济”:观点评述与新的解释》,《社科纵横》第5期。
- 李小丽,2008,《农业现代化与现代化农民》,《学术交流》第7期。
- 林毅夫,1988,《小农与经济理性》,《农村经济与社会》第3期。
- 刘金海,2013,《“社会化小农”:含义、特征及发展趋势》,《学术月刊》第8期。
- 刘金源,2001,《农民的生存伦理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
- 刘拥华,2008,《布迪厄的“终身问题”》,《社会学研究》第4期。
- ,2009,《从二元论到二重性:布迪厄社会观理论研究》,《社会》第3期。
- 刘少杰,2002,《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陆益龙,2008,《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2014a,《大赛与小岗:农村典型建构及意义的再认识》,《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2014b,《农民新生产要素的使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0CGSS的实证分析》,《社会学评论》第6期。
- 恰亚诺夫,1996,《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舒尔茨,1999,《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斯科特,2013,《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王露璐,2015,《从“理性小农”到“新农民”——农民行为选择的伦理冲突与“理性新农民”的生成》,《哲学动态》第8期。
- 王树生,2007,《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 王宇雄, 2016, 《农民现代化的一个路径: 农民合作助推农民转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 徐勇、邓大才, 2006, 《社会化小农: 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 《学术月刊》第7期。
- 姚自立、张红, 2016,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生产经营观念的变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4期。
- 周星, 2017, 《“生活革命”与中国民俗学的方向》, 《民俗研究》第1期。
- 朱启臻, 2013, 《新型职业农民与家庭农场》,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Reference Experience and Comprehensive Circumstances: An Interpretation to Peasant's Farming Practice in Dingzhou

ZHANG Long

Abstract: “Moral economy” and “economic rationality” are both classic theories to interpret peasants' farming tendency. They became theoretical basis of discussions about contemporary peasant's logic in farming performa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ose theories can be used as analytical tools, but should not be restric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peasants. “Moral economy” or “economic rationality” cannot fully explain the logic that guiding peasants' agricultural behavior. Their farming performances are based on fully concern about reference experience. It is the logic of practice which guides peasants' agricultural behavior. This suggests us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circumstances which peasants faced with. Thus we can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easants and also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Reference Experience; Comprehensive Circumstances; Farming Practice; Logic of Practice

(责任编辑: 陆益龙)